

大局



◎周兴维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三江”(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并流而不交汇,是世界上极为罕见、奇特的自然地理现象,也是世界上最壮丽的自然景观之一。“三江并流”地区位于云南西北部(滇西高原),其间,澜沧江与金沙江最短直线距离为66公里,澜沧江与怒江的最短直线距离不足19公里。2003年7月,“三江并流”地区顺利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所凭借的正是其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

三江并流地区的核心地带——丽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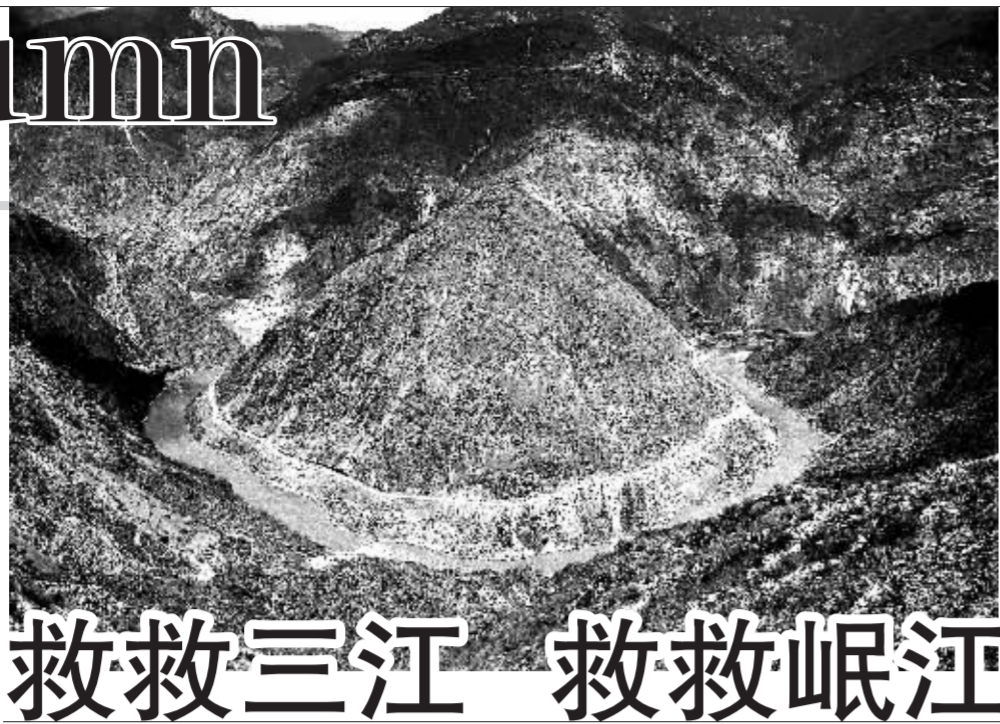
三江并流地区的地理位置——东亚、南亚和青藏高原三大地理区域的交汇处;

三江并流地区的自然景观——纵横丽江地区、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三江并流地区的人文价值——16个世居民族的聚居地,是世界上罕见的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共存的地带。

简言之,三江并流地区具有独特的举世无双的地质价值、生物多样性、自然美学价值、多民族文化价值。这当中,“虎跳峡地区”对“三江并流”顺利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又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但很“不幸”,三江地区的水能资源太丰富了!当“GDP”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时,管理



# 救救三江 救救岷江

层对世界“将不遗余力保护这一地区”的郑重承诺便无奈成了一块“桥板”。半年不到,“申遗报告”墨迹未干,以“开发水利,脱贫致富”为名的破坏已悄然而至:

上虎跳峡、下虎跳峡、鸿门口、金安桥、鲁地拉、观音岩……多少大型特大型梯级电站纷纷“上马”或准备上马……

当人们兴致勃勃领略“高峡出平湖”的壮美景象并在大闸前等待放行时,才蓦然发现,我们已然诀别了一个原生的三峡生态系统。但是,大规模的水工开发果真能让多民族地区的立竿见影“奔小康”?星罗棋布的水电站的经济收益、生态效益和社区利益果真可以求得长期均衡吗?

在天府之国四川乐山,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环抱,簇拥着两个“双遗产”。岷江,一条充满传奇色彩的大江——串起

如此之多的“遗产”:九寨沟,黄龙,都江堰,青城山,大熊猫栖息地,大佛,峨眉山。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作为长江上游最大支流的岷江,就要毁于一旦了!——2006年8月中旬岷江断流,史无前例,一道道大坝截流是罪魁祸首!

都江堰上游的紫坪堡工程已经严重破坏了岷江流域尤其川西平原的自流灌溉农业,是当今世界唯一的大面积、具有可持续发展自然机制的生态农业——其自然法则:不搞大项目,不搞大工程,不搞大建筑。一言以蔽之,绝不大兴土木。而如今,这个优秀的传统已丧失殆尽!这还不够,还要在都江堰的心窝上捅一刀,愣要搞一个杨柳堡(紫坪堡的调水工程)。在各界有识之士的奔走呼号、倾力輿请的“压力”之下,杨柳堡暂停了。但只是暂停,说不定哪天又会随着“水工大开发”的热潮而再度上马。岷江上游大大小小的水工项目已经把流域的生态

破坏得千疮百孔、恢复无期,“天保工程”毁于一旦;若杨柳堡真的再度上马,造福川人2000年的都江堰将毁于一旦。

历史上的四川生态究竟是什么样的呢?美籍人家歌曰:“涂山山下好风光,丽日梯田映岷江”;马可·波罗记曰:“越秦岭入川凡二十日抵成都,沿途所见,多属森林地,有许多野兽,如虎、熊、羚羊之类,二十日路程完全在山谷树林中……”

可如今,一股失控的“圈河”狂潮正在岷江肆虐,有据可查的“违规”工程多达十几处。过都江堰溯岷江而上,但见彩旗飞扬处,民工吆喝,马达轰鸣,钢钎大锤叮叮咚咚,车辆机械穿梭如蚁;远处尚有青山绿水,脚下只见斑斑创伤,晴天黄土蔽日,雨天浊流灌江……

“违规”水电投资少则上亿多则几亿,“处罚”他10万8万只是“九牛一毛”。有本事的,把“天公下雨落金钱,地母发水来红利”,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更有高层次的,竟然

能把“水工”项目变成了“水功”项目,变成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支柱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但凡江河行地之处,水工开发无不轰轰烈烈。

水,祖国大西南地区自然禀赋的优势资源,水利开发有巨大的眼前利益,因而是“熊掌”;而生态保护、生态开发虽然利益长远,但见效慢、收益低,因而是“鱼”。决策当局如何求得两者的平衡?或曰:“鱼”和“熊掌”,皆吾之所欲也,若两者不可兼,取“熊掌”而舍“鱼”焉。怎么算这笔账?事实上,一处处“纳西雅阁”的消失,并不仅仅是“驴客”的切肤之痛;当人们肉身赖以生息、繁衍和人类精神由以寄托、皈依的山林水土在“人们自己的手中”日益凋敝、腐朽、衰败时,结果将是整个民族的灾难。山、水、林原本三位一体,是各族黎民百姓“奔小康”永不贬值的“固定资本”,也是各族黎民百姓“乐林”不疲、实现生态和谐保障。而遍地开花、为短期局部私己所得一叶障目的“水工大跃进”,虽然轰轰烈烈,但破坏了生态、破坏了山水林的三位一体与人的和谐,还会有长久价值、普遍价值吗?

虽然太阳每天都从东边升起,但“消失的地平线”却再也不会回来。惟“纳西雅阁”所蕴涵的历史密码与人的生存和思想、精神永远相伴相随。“富民升值”切忌“竭泽而渔”,中华民族的资源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有四言打油诗曰:  
围河围水,利令智昏。  
近忧远虑,水工快息。  
投资投机,勿为财死。  
大贪小贪,还我河山。

乱弹

## 不是发现价值,而是发现机会——陌生的市场之一



◎洛洛华  
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并购部副总经理  
上海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每天上午和下午,我们都会听到同一个人对于大盘发出不同的判断。“头部,绝对是M头!到了下午,预测就变成了‘M头套W底’”。

是我们错了还是市场疯了?看来是市场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是我们过去不熟悉的一种市场环境;全流通之后第一批法人股解禁了,下半年国家将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 QDII出海投资了,一批融资额巨大的IPO将在下半年集中上市,融资规模将创历史新高。诸如此类的新问题在今天的市场上集中出现,面对这种新的市场条件,我们在过去十多年股市上积累起来的经验均已不再适用。这是一个全流通的新市场,这是一个中国对外开放金融市场的新时代。无论是管理层、投资银行,还是上市公司,抑或中小股民,都需要新的思路来指导投资。

“山中无一日,世上已千年”。金融学在最近15年取得的进步是惊人的。现在许多投资基金经理在热烈讨论构建最佳投资组合,而国外的机构投资者则在深入研究新的对冲交易策略。组合和对冲有着根本的区别,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听起来很简单:我们并不能发现价值,价值是由那些优质公司的额外努力而创造出来的。我们只能发现机会,发现市场上稍纵即逝的不合理价格差。更有些惊世骇俗的教条是这样的:投资的股票并非是你手里持有的任何资产,我们持有的只是误差项。

在对冲基金看来,把一堆精挑细选的股票拿在手里并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应该看好一个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买入这个公司的股票,然后把影响该公司股价的其他风险因素在市场上对冲掉,对冲完成之后剩下的误差项就是市场对该公司竞争力的定价。

我国即将推出股指期货这个新的交易品种,这对于市场上的大多数投资者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指数期货的推出适应了资本市场新的实践需求。许多投资者曾经以为,允许做空股市会导致股价下跌,这些担心是不必要的。我曾经举过一个不太适宜的比喻:如果一个国家不允许离婚,那么这个国家的结婚率就会很低。如果一个国家允许离婚,人们反而敢于登记结婚了。同样的道理可以用在股市上,如果我们不允许做空股票,那么那些做多的努力就会变得很犹豫。因为我们必须承担一种额外的风险,万一做多的努力失败,就会蒙受损失。现在有了股指期货或者融券等做空工具,我们反而找到了一种方便的对冲工具。市场上的做多热情反而因此会被激发。

这些天来,大家已经在热烈地议论如何利用股指期货来创新交易。其中讨论的比较多的一种方法是:如果我们看好中国石化的竞争力,认为其综合竞争力超过全国企业的平均水平,那么,我们就可以买入中国石化的股票,同时卖出沪深300股票股指期货。这个做法的基本出发点是:中国石化的股价既反映其核心竞争力和经营水平,又受到股市其他一般事件的波动的影响,我们将股指期货做空,等于将捆绑在中国石化上的市场风险对冲掉了,而仅仅持有针对中国石化经营能力的多头头寸。当然,这样的做法在技术上还有一个重大的难题,这就是对冲比例的确定,这是将来许多机构投资者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难题之一。

排沙淘金

## 去掉“内置的帽子”



◎王育琨  
管理专家  
首钢发展研究院企业所所长

那一年甲骨文 CEO 拉里·埃里森被邀请去斯坦福大学参加毕业典礼时,置主办方的殷殷之情于不顾,做了一番最不可思议的演讲。对那些就要毕业的学生,他感到绝望。对那些新入门的学生,他唯一的劝告是:“收拾好你的东西,带着你的点子,别再回来。退学吧,开始行动。我要告诉你,一顶帽子一套学衣服必然会让你沦落!”

这些看上去荒谬绝伦的话,总让我感受到一种冰冷的现实。人们被诸多语言之真理固住了。过量的知识或过量的历史,形成很大的重负,窒息一个人最强烈的本能,如热情、反抗、忘我和想象力。武学的极至讲求忘掉招式和套路,身心融于一种自然;商业的极至讲究的是去掉“内置的帽子”,进入一种自由的状态。

对那顶“内置的帽子”提出质疑的不止拉里一个人,经营大师松下幸之助、安迪·葛鲁夫、山姆·沃尔顿以及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都持有同样的看法。索罗斯早年师从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拉贝,深受其开放社会的理念所影响,与一般实用主义投资家不一样,他是以一种深刻哲学思想背景和理念来认识社会、经济金融市场并进行操作。因而在较深刻的层次上,形成了其特立独行的思想、理论、观点和方法。而波普关于人的认知可错性(FALLIBILITY),就是他思维的出发点。

索罗斯把那顶“内置的帽子”归结为人们的偏见,它们往往又会集成为诸多理论的假说,约定俗成的规则,甚至难以动摇的体制。这些偏见的集成缺乏对人类知识可错性的自觉,也缺乏对认知作用与参与作用互相干预的了解。索罗斯赚钱的奥秘恰恰在于其反向思维,发现市场与制度缺陷,并自觉利用这些缺陷赚钱。索罗斯成功预测1987年的崩盘,还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赚得钵满盆溢。因此,连他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泼去的所有污水,也都更有市场。他认为,对放任市场的盲目信仰,是建基于市场机制趋向均衡并实现最优配置的这项假设。这个“内置的帽子”,恰恰是市场的

根本缺陷,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

人类对世间万物的认知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天生就容易出错,这是一个人判断世人和他自己的基本尺度。索罗斯相信他与众不同的最大能力,就是他很快地察觉过错。能做到这一点,势必拥有较为敏锐的心智及高人一等的勇气。当然,纠错误对索罗斯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而且像呼吸一样自然。他清楚,只要知道大众和他自己的缺点所在,他就能乐观地领袖市场。索罗斯常与实际操盘人检讨及辩论投资问题。他的问题既专业又刁钻,直到再也问不下去的必要了,他才放心去投资。

抹掉永远正确的光环,扔掉自尊这顶“内置的帽子”,使得拉里·埃里森与乔治·索罗斯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力量。这种力量并不是我们通常想像的远见卓识与果断魄力的结合,而常常表现为视野的局限性和行动的彻底自由的融合。不少人对错误耿耿于怀,总要花费许多心思去化解、解释、寻找不是自身错误的理由。在这样苦苦寻找的过程中,错误提供的巨大机会也就消失殆尽。商业领袖们就没有这么傻,他们敢赌不起功夫,错误提供的商机可能只有几秒几秒,抓不住便全盘皆输。任何一种错误,都有着强化自己的本能。任何一种行为都有上千条理由确定它的正确。尤其当一个人在组织中只有相对的控制权时,面对一辆随时可能落下的尚方宝剑,他必须像小姐那样提心吊胆。

去掉了“内置的帽子”的商业领袖们,看上去毫无负担。什么前人的经验、行业规矩、通行准则、个人资历、关系网络、权威视野、个人尊严等等一切都左右不了他们,唯有现实的焦点问题能引导他们追求一个又一个方法和一个又一个更新的自我。

长短集

## 创新六问



◎胡晓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  
部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在经济全球化的汹涌大潮裹挟下,中国不得不面对来自外国技术、专利和产业标准的日益加大的竞争压力,愈发感觉到自身的经济拓展空间不断萎缩。正是立足在这样的起点上,由中央政府发起,全国各个层面迅速掀起了一股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热潮,期盼中国能够拥有像发达国家那样的自主创新能力。然而,回顾以往自主创新能力的演化历程,甚至全社会的自主创新战略是缺乏规划的,新一轮“一涌而上”的“创新热浪”先天不足。笔者在此提出六点疑问:

1、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足够重视,创新热浪能够出现吗?

中央政府对自主创新的重视是处于全局的考虑,是处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忧虑而提出的,但最终这个问题能否得到解决还取决于企业是否重视,科研院所是否重视,甚至全社会是否重视。虽然我们感到庆幸的是,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开始到媒体、学术界和地方政府的眼帘,但令我们颇感不解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设多年,为什么创新发展没有由微观主体提出来,似乎只有由政府感到焦急,其他微观主体并没有感到紧迫。这样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思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也许可以取得突破性的成绩,但在一个追求竞争和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样的发展思路还能够取得实质的突破吗?

2、行为主体之间目标的不同,最终能够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吗?

如果创新本身不能够带来较高的利润回报,企业是没有动力去创新的。但一个内在的矛盾是:一项创新行为的发生、开展,及至获得回报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如果有企业的长官任命制度没有从根本上打破,他是不会、也不愿意为他人做嫁衣的。反过来,政府领导的任期也

是有时间限制的,对于企业创新效果的漫长等待,需要政府领导具有很强的忍耐力。而这一点,在创新政绩观的驱动下,能够保持得住吗?显然,这是一件不可强求的事情。最终的结果,也只能依靠领导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来维持了。

3、现在对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手段主要诉求于激励政策的实施,这种激励政策究竟能够走多远?

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许多地方决策者都在期盼着中央政府能够给予多少的资金支持,而许多地方性企业也在期待着当地政府的资金支持。我们不可否认,高强度的激励政策可以带来暂时的效果,但有两点要注意:一是以资金支持为导向的政策,其实施的持久性和持续能力真的会带来强大的效果吗?二是如果资金支持力量降下来,企业还能否自觉地开展创新活动吗?

4、在急功近利的目标驱使下,战略规划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吗?

当创新成为一个时髦的词汇时,当地方政府都把创新作为一件可以炫耀的事情时,也许创新发展观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主导力量。但它也可能产生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急功近利的特性促使创新行为和创新能力脱离了自身的能力基础,创新泡沫和创新幻觉开始涌现,而这些不仅不会提升创新能力,相反还会把整个社会带入到“创新浮夸”的不良风气之中。对此,现有的战略规划和政策设计中似乎并没有一个前瞻性的应

急制度安排。

5、在原有体制架构下,创新能力能得到显著提高吗?

人的行为总是制度环境的变量,离开了特定的环境,人的行为将出现显著的异化,这对于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也不例外。从当前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来看,创新已不再局限于技术领域,它涉及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等多种领域,甚至创意也是广义创新的一个内容。由此出发,笔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创新更加强调宽松的体制环境和自由的创新氛围,提高创新主体的自由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已经成为新一轮全球创新竞争浪潮的制胜法宝。然而,中国长期改革发展的结果,并没有完全打破“官本位”,“长官意识”,它们还在很大的范围内存在,这将不利于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正所谓:“创新未动,体制先行”,能否实现体制的率先突破将成为推动创新能力提升的首要前提。

6、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评估指标?

在研究驱动创新的对策时,学术界和政府总是拿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创新指标作为对比,并从中找出本地区的创新能力的差距。这种方式看似既直观又有效的分析思路,被迅速地在各地推广开来。甚有独创者,自己编制一些指标来评估和检测。笔者认为:这在理论研究上也许并无过错,但把它应用到实践过程中,未免过于草率。一方面,各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和发展特点各异,以同样的指标衡量比较,缺乏说服力。另一方面,创新能力是一个内生变量,政策考虑的应当是如何提高创新内生化的力度,而现有的指标评价只是把创新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来看待,这种颠倒研究目标性的思路,是很难制订出适宜于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差异化创新对策的,结果只能是各地区创新思路大同小异。

转型深圳

## “深港一体化”水到渠成



◎魏达志  
深圳大学  
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在“共同市场”的格局下,深港地区的四大流通包括资本、商品、人力和服务的流通正在形成潮流,为“深港一体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就总部集聚机遇而言,CEPA进一步巩固了香港作为珠三角经济中心和深圳作为副中心的作用,奠定了深港经济一体化的政策基础并明晰了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的路径选择。CEPA出台一年后,跨国公司在香港设立的机构创出新高。根据香港统计处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驻港地区总部共有1167家,驻港地区办事处共有2631家,分别比上年增长6.28%和4.77%。由于总部经济所具有的辐射性、共赢性特征,将使深圳进一步对建设国际化城市的自我提升,进一步抓住引进跨国公司的总部和区域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的新的发展机遇。可见深港将有机会形成新的集聚效应与跨国公司投资的蜂拥效应,成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更大规模的集聚地和营商中心,并使得香港与深圳能够进一步互动式发展。

在战略叠加机遇方面,中国与东盟、东亚的一体化进程是国家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麦肯锡的一项研究,一旦东盟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整个区域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10%,商业运作成本将减少20%,这意味着东盟整体国内生产总值将会每年增加500亿美元,加上中国则成为世界除欧、美之外的第三大一体化联合体。因此,促成欧、亚、美三足鼎立的相对稳定态势,通过经济、科技、政治、军事的多极化来赢得世界性的和平与发展,同时发展与东盟和东亚的经济合作又是深港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走出去的必然内容,从而实现国家安全战略和地区发展战略的叠加效应。

若CEPA、PECO(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和CAFTA(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三大战略形成叠加之势,将形成学术界所称之的“C-P-C”经济。2005年1月,深圳发布的《深圳融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深港合作圈”与深港经济合作的重要作用

和地位。因此,深港两地政府如果形成合力,共同依托内地、走进东盟,推动企业拓展更大的市场空间,便能赢得在“共同市场”格局下经济与产业的溢出效应。

再看空间布局机遇,当泛珠三角以相当于南中国的地理位置与东盟十国的一体化连接,使得香港、深圳地区成为一个新的、实际的、地理空间的几何中央节点,这对于具有地缘意义的经济发展、金融开放、引进输出、资源配置、流量经济和物流布局均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广东与周边八省,人口达4.5亿,占全国的34.76%,再加上港澳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同时,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使东盟向中国的投资增加48%,使东盟的GDP增加0.9个百分点;使中国向东盟的出口增加55%,GDP增加0.2个百分点。同时,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会大大增加。

当深、港与珠三角地区成为一个新的地理空间的中央节点,作为一个重新组合、辐射内外的城市群,其经济总量与吞吐能量将成为当代中国的第一经济增长极,深港经济与产业的发展、产品与技术的输出,不仅能够寻觅巨大的市场与商机,而且将又一次赢得巨大的空间扩散效应。而这一切,都需要政府更加明确的区域经济、产业经济的正确导向和政策支持。

如果说,当年建立经济特区等是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当前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在共同市场格局下实现与香港的一体化连接,就意味着打破传统的封闭体制,建立更加对外开放的国际化体制,生产力的国际化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国际化变革,因此,在打破传统的封闭体制建立更加开放的国际性体制方面,任何走在改革前沿的城市和地区必将赢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和制度性效益。

推进“深港一体化”是双赢的,推进的力度越大,效果就越好。